



主 编： 陈青云

副主编：周瑾 王诚

编 委：吴玥 殷建玲 孙慧 辛建群

2024 年 4 月 30 日

目 录

☆ 特别报道.....	1
教育部部署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1
2024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	1
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2
教材建设和管理国家级培训启动.....	2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教育部召开教师队伍建设工 作部署会	3
☆ 百家论坛.....	4
重改革，抓好教师队伍治理优化.....	4
重机制，抓好师德师风建设.....	5
重提升，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6
构建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	7
☆ 教育教学研究	9
指向高质量发展：科学教育评价价值取向和路径优化.....	9
教材建设要做到“五个坚持”	13
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15
教学主张：名师成长的新动能.....	17
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评价是应时之举.....	19
☆ 国际视角.....	20
“术语”与“俗语”：即将离任的 IES 主管对教育研究的感悟‘Jargon’ and ‘Fads’: Departing IES Chief on State of Ed. Research.....	20
☆ 教材建设文献索引	25

☆ 特别报道

教育部部署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等现象 严查各类跟招生入学挂钩、关联收费行为
林焕新

为全面加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管理工作,促进教育公平,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开展义务教育阳光招生专项行动(2024)的通知》,要求全面排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和公民同招入学政策、规定、程序、办法,增强招生入学工作的科学性、规范性、透明度,坚决整治“暗箱操作”“掐尖招生”等现象,严肃查处各类跟招生入学挂钩、关联的收费行为,健全公平入学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教育满意度。

《通知》提出五项重点任务。一是优化招生入学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全面排查本地区已有义务教育招生入学政策措施内容,坚决纠正或废止不符合国家政策精神和要求的相关规定和做法。二是严格规范招生行为,要求各地对照中小学招生入学“十项严禁”规定,针对招生入学中的重点环节,对区域内义务教育学校开展全面排查,坚决纠正将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培训证书以及学科竞赛成绩、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参考或依据,以及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关联的“捐资助学款”“共建费”等违规行为。三是强化招生信息公开,要求各地增加招生入学工作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主动公开招生政策、划片范围、报名条件、招生程序等群众关心的重要信息,建立响应机制回应社会和家长关心关注的问题,建立并公布专门的招生入学热线,畅通政策咨询、举报申诉等渠道。四是优化招生入学流程,要求各地严格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提升效能的政策部署,进一步优化登记入学、电脑派位工作,便捷招生入学流程,减轻群众负担。五是保障特殊群体入学,要求各地加强辍学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留守儿童、残疾儿童等特殊群体入学保障工作,确保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应入尽入、应保尽保。

教育部将成立由部内相关司局、地方教育行政部门人员、国家督学、基础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等组成的专项工作组,加强对各地招生入学工作全过程监管和工作指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招生期间问题频发、舆情较多地区和学校的指导,对违规招生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教育部将适时开展专项行动调研和全国范围跨省交叉互检,通报违规行为和查处情况。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12

2024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启动

从 4 月至 12 月初按照“一省一周”统筹安排
张欣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印发《关于举办 2024 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的通知》。《通知》明确,本次活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时间为 4 月至 12 月初,按照“一省一周”统筹安排各地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贯穿全年。

《通知》要求,各地积极发挥教育、宣传、文化和旅游、工会、老龄工作系统资源优势,

推动央地联动，创新载体形式、丰富活动内容，突出地方特色，激发全民参与，开辟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新路径，推动各地错时开展，在全国层面形成“周周有活动、省省有特色”，助力“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建设。

《通知》明确了五项活动内容。一是创新开展特色学习活动。要创新载体、形式和途径，结合地方特色，确定活动主题，线上线下相结合，调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活动，打造规模更大、内容更丰富、活动更精彩、氛围更浓厚的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二是深入开展常规学习活动。要深入开展全民阅读活动，通过开展主题阅读、开设线上社会大讲堂、数字阅读分享等活动，持续打造品牌阅读活动。结合全国青少年和老年人读书行动，推进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区建设。三是开展“百姓学习之星”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活动。要深入挖掘，大力宣传一批坚持终身学习奋斗成长的励志人物，带动群众学习事迹突出的、具有时代性和典型性的先进人物。四是开展“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巡展活动。要突出地域特色，统筹学习资源，打造满足学习者需求的“终身学习品牌项目”，引导广大群众参与终身学习。五是数字赋能全民学习。要积极打造终身学习数智化服务平台，推进跨平台、跨地域、跨层级的学习资源整合与共享开放，积极开展线上学习活动，推进个人终身学习账户建设，形成个人终身学习数字档案，支持学习成果的认定、累积和转换，开展老年数字阅读推广工作等。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19

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印发通知

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

张欣

为切实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近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印发通知，对开展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为中小学教师减负专项整治工作作出部署。

通知明确了专项整治的范围和目标。集中整治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活动和工作随意进入校园情况，以及社会事务进校园过程中重留痕轻实效的形式主义，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批报备制度和监督管理长效机制，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

通知提出四项主要任务。一是系统摸排近年来社会事务进校园情况，制定准入标准，加强问题整改。二是建立社会事务进校园审批报备制度，严控省、市、县三级社会事务进校园总量，建立白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三是对社会事务进校园的具体方案进行审核，可根据工作实际进行整合，严控活动范围和时长，提升进校园活动质量。四是通过监测、核查、通报等方式，常态化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提高站位，压实责任，把规范社会事务进校园作为教育系统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重要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持续推进专项整治工作走深走实，以师生获得感检验专项整治成效。

《中国教育报》2024.4.25

教材建设和管理国家级培训启动

林焕新

按照国家教材委员会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系列行动部署，4月23日至26日，教育部在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举办全国教材管理人员培训班，正式启动教材建设和管理国家级培训。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总督学王嘉毅出席并作专题报告。

王嘉毅指出，开展教材建设和管理国家级培训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举措，

是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成体系、专业化的培训，目的是推动建设一支政治立场坚定、专业水平过硬、熟悉教材政策的教材工作队伍。教材战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力抓好教材建设国家事权落地、铸魂育人实效提升、服务国家战略、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教材治理体系完善、教材研究组织化实施等关键任务，全面提升新时代教材建设和管理水平。

培训班上，教育部、中央党校、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部门和单位有关负责同志以及教材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教材政策文件、国际发展动态等作专题报告。培训还安排了分组研讨、专题交流、现场教学等环节。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部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分管教材工作的负责同志以及相关业务处室负责同志参加培训。按照计划，教育部将陆续举办全国教材编写人员、审核人员、研究人员、马工程重点教材任课教师等专题培训班，全面覆盖教材工作各支队伍。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26

打造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教育部召开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部署会

蒋亦丰

日前，教育部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 2024 年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部署会，落实 2024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教师队伍建设进展成效，分析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新形势，研讨交流地方和高校典型经验，部署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会议指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教师队伍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2024 年是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正逢第 40 个教师节，教师队伍建设面临新形势，应担负起新使命。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化为抓教师队伍工作的高位认识、政策举措、务实行动，在统筹谋划、机制建设、协调统合、宣传推广、督查评估上下功夫，深入推进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建设。

会议要求，要聚集教育强国建设的总体目标，聚焦支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总体要求，切实做好教师队伍建设的重点工作。重引领，抓好教育家精神弘扬践行，办好第 40 个教师节宣传庆祝活动。重机制，抓好师德师风建设，完善师德师风长效机制。重提升，抓好教师培养培训，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提高基础教育教师整体素质，增强职业教育“双师”能力，提升高校教师创新水平，实施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重改革，抓好教师队伍治理优化，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推进教师管理综合改革。重优待，抓好教师待遇保障，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成果，推动提高教龄津贴标准，研究制定教师优待政策，提升教师待遇，保障教师权益，增强广大教师职业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

会上，浙江省、河北省、黑龙江省、甘肃省、湖北省、广东省教育厅和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电子科技大学作交流发言。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同志、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负责同志和部属各高等学校负责同志参会。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2

☆ 百家论坛

重改革，抓好教师队伍治理优化

罗生全

教育部召开的 2024 年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部署会指出，“重改革，抓好教师队伍治理优化，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优化教师资源配置，推进教师管理综合改革”。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教师队伍是重要的基础工作。教师队伍建设亟待以高质量为核心，从“质量管理—质量监测—质量保障”三方面，全面推进教师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在推进教师队伍质量管理方面，要着力于提升教师队伍治理效能。“放管服”治理模式下，教师队伍高质量治理的方向是从“政出多门”走向“权责一致”，全过程服务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整个过程。

一是推进教师职业准入和退出的“管理闭环”改革。目前，虽然我国教师的准入坚持“公开招聘、竞聘上岗”的原则，基本建立了规范有效的退出机制，但在具体管理中，通常按照《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进行教师管理，未能充分体现教师职业的特殊性。因此，有必要进一步修订相关的法律法规，合法化保障教师的“权责利”。除了完善教师劳动合同法、教师法中对教师任用、培养、激励等的权责分配外，还要配合适当的救济程序和救济制度。二是深化教师考评和职称制度改革。教师职称、待遇等的同步提升更有利于提升教育质量。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教师考核要从“硬指标”转向“软硬指标兼具”，突出对教师能力、成绩和贡献的评价，形成奖励和惩戒制度相适应的教师考核制度。三是分类推进教师编制制度改革。在教师编制紧缩的背景下，提升教师职业的吸引力要转向拓展教师个体生存发展空间和提高工资收入，推进教师编制改革走向“引育结合”，将教师编制改革的竞争性、灵活性与教师职业发展的稳定性、长期性相结合。

在推进教师队伍质量监测方面，要着力于优化教师资源配置结构。教师队伍建设质量水平直接表征为教师资源配置均衡程度，目的是加大教师统筹配置和跨区域调整力度，促进教师的合理流动，缓解教师的结构性短缺。

除了关注不同教育阶段教师队伍“纵向梯队”配置的均衡度，还要重点监测城乡、区域、学校之间教师队伍“横向梯队”配置的均衡度。城乡之间教师资源配置均衡的关键在于推动城镇教师向乡村学校、薄弱学校流动，促进城乡教师交流轮岗制度化。区域之间要重视优质教师在同一类学校、同一年级的配置情况，形成普通教师、骨干教师、优秀教师常态分布的格局。学校之间的教师资源配置，一方面要重视教师队伍建设中“班师比”“师生比”的均衡，以及学科结构、性别结构、职称结构、专兼职教师结构等方面的均衡；另一方面要重视职业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间教师结构的优化，尤其要加强普通高校专业课教师和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的融合共享。

在推进教师队伍质量保障方面，要着力于构建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一是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要建构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文化属性是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

与其他国家教师标准体系的本质区别。构建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要依托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在教师育人能力、教师结构准入标准、职称管理、教师评价与激励、教师岗位配置等方面凸显自主性、教育性和中国性。二是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要体现中国实践特色。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生发于中国教育本土实践，应挖掘、提炼、总结出适用于中国教育规律、学生发展规律和教师成长规律的标准，如教师的师德师风标准、专业成长标准等。三是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要对话“世界一流”标准。将高质量教师队伍置于世界坐标中，阐明中国特色教师标准体系与其他国家教师标准体系之间的关系，为世界教育学科发展贡献知识创新，也为其他国家教师标准体系建设提供中国方案。（作者系西南大学教师教育学院院长、教授）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16

重机制，抓好师德师风建设

刘世清

近日，教育部召开2024年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部署会，深入探讨了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与新使命，强调要重视长效机制建设，切实将师德师风建设抓紧抓好。

当前之所以强调狠抓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效机制，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师德师风的形成非一日之功，是教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遵循与养成的道德规范和情操品质，需要较长时间的磨炼与积淀。这一规律决定了师德师风建设需要长效机制。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化，对师德师风产生了影响。社会中存在的功利化价值取向与浮躁氛围对教师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带来冲击与挑战。个别教师理想信念模糊、育人意识淡薄，其不良行为严重损害了教师的社会形象与声誉。这些问题的解决也需要长期应对。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师德师风问题，强调师德师风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第一标准。党和政府更是把师德师风建设作为加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的首要任务，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对师德师风建设既立规矩亮底线，又整体部署系统构建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制度体系，同时还特别强调要积极建立健全师德师风的长效机制。

师德师风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总开关”。现实中，一些地方和学校对师德师风建设重视不够，工作方法陈旧，机制建设滞后，忽视师德师风养成规律、社会变革转型带来的负面影响，师德师风建设缺乏科学性与实效性。面对新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人才培养、社会建设的新要求新挑战，迫切需要把师德师风建设的长期性和紧迫性结合起来。从师德师风养成的内在引领、外在规则与大环境氛围三方面着力，强化长效机制建设。

强化思想铸魂与价值引领。思想价值是航标，航标越明确，师德师风的内在方向就越清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教师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光荣使命，是打造中华民族“梦之队”的筑梦人，必须突出政治标准的首要地位。广大教师要不断强化思想铸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心怀国家使命，着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持续加强政治学习；不断强化价值引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管理全过程，持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发挥文化涵养师德师风功能；不断提升自身综合素质，坚守育人初心，将上好课、教好书、育好人作为主业，努力成为“经师”和“人师”相统一的“大先生”。

强化规则立德与日常管理。无规矩不成方圆，规则越明确，师德师风的底线边界就越清晰。在法治化建设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下，广大教师要积极学习教育法律法规，不断强化法规意识，不断提升依法执教、规范执教的能力。对于个别违反师德的“害群之马”，教育系统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处理，对于典型案例要加强警示教育，引导广大教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坚守师德底线。学校要不断强化日常管理，规范招聘引进流程，严格思想政治和师德考察，把好教师队伍入口关；严格规范教师聘用，将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评价的首要位置；严格师德督导，建立多元监督体系，严格惩处治理师德突出问题。

强化各方联动与氛围营造。社会氛围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对师德师风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要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加强新时代教师风貌的媒体宣传，传递教师正能量；切实提升教师社会地位，在行业企业服务中对教师实行优先或优待；健全多元教师荣誉表彰体系，不断激发教师从教乐教热情；加强教师权利保护，深化明确教师教育管理学生的合法职权，切实维护教师职业尊严，对侵犯教师权益的行为要依法追究相应责任；积极在大中小幼校园开展尊师活动，厚植符合时代精神的师道文化；加强家校联系，引导家长尊重学校与教师安排，配合学校做好学生的学习教育，切实提升尊师重教氛围营造的日常化与长效化。

师德师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持续发力。各级政府和学校要不断完善长效机制，切实抓紧抓好师德师风建设，不断弘扬尊师重教传统，努力让教师成为最受社会尊重和令人羡慕的职业。（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11

重提升，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

吴颖惠

日前，教育部在浙江省杭州市召开 2024 年教师队伍建设工作部署会，明确提出“重提升，抓好教师培养培训，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这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行动，也是支撑高质量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教育是一项专业性工作，教师需要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才能获得职业精神和专业能力，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教师教育工作，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教师职前与职后培养培训体系。包括职前教师培养体系、入职遴选与培养体系、职后研修体系在内的系统化结构，涵盖了职前、入职、职后等关键阶段。高等院校是职前教育的主体；县（区）是本区域内职后教育的主体，承担着研训一体化的培训功能，是集教研、科研、培训和信息应用一体化的区域性教师发展支持系统；学校则是教师职业发展的主要场域，通过校本教研和校本研修，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有必要从时代性、文化性、专业性和体系化等视角来审视，构建纵横交错、精准匹配的教师发展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教师思想政治素养、职业道德素质和专业能力素质，实现教师队伍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性发展，培养一批胸怀天下、思想政治素质过硬、立德立身立教、心系人民福祉的优秀教师。

其一，充分汲取中国传统教育思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职业道德建设是教师教育的首要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教师修德、修道与修身具有深厚的滋养价值。继承与发展

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思想，加强师德师风建设，能够加深教师对教育职业的高度认同感，进而不断提升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

其二，立足本土语境，完善教师教育全要素标准体系。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对完整的教师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包括专业认证标准、师资标准、专业标准和课程标准，对师范生进行标准化的培养。同时，也建立了教师资格认证体系，对教师的专业性进行明确规定和严格考评，确保师范与非师范专业的毕业生在接受一定的教师教育之后，能够考证取证、持证从教，打通优秀人才进入教师队伍的通道。但是大量教师的职后培训或研训仍然缺乏广泛认同的教师教育标准。教师职后培养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建设与完善。

其三，根植于教育改革实践，明确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教师教育课程标准必须立足新课标、新教材的目标要求，明晰新时代教师在培育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上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能力与伦理指标。要基于学生管理、教学流程、课程设计、实践教学、学生评价等内容，及时更新教师专业发展标准，为教师培养提供目标引领。同时，要建设教师教育课程的专业共同体，落实教师培养课程实施的基础设施、资源配置、经费保障和实践基地等基本条件，确保教师教育课程得到科学实施。

其四，充分依托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力支持。在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教师教育必须充分利用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现代信息技术优势，整合跨时空优质资源，构建全过程、全要素、高互动的数字化教师教育系统，探索技术支持教育的新路径，全面赋能教师职业发展与专业成长。

其五，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必须是开放、协同、联动的，体现于职前、入职、职后的生命周期之中。需要健全师范院校、综合性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社会教育机构等多主体参与的机制，不断完善教师教育的法律体系、政策体系、执行体系、保障体系、评价和监督体系等。教师教育体系建设需要基于最新的教育研究成果，积极引入神经认知科学、教育心理学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最新研究成果，及时更新教师教育的课程内容体系和实施评估体系。

今年恰逢第 40 个教师节，为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体系奠定了良好的氛围，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与职业成长的良好契机。新时代教师不仅要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专业精神，还应该具有较强的职业道德、职业认同、职业情感和职业精神。只有教师的专业性人格与职业性人格有机融合，才能够满足教师自身职业诉求与社会理想期待的高度统一。（作者系北京市海淀区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12

构建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

李永智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集成上线以来，突出应用服务导向，扩大优质资源共享，推动教育改革创新，从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的“3C”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为广大师生和社会学习者提供了“一站式”服务。两年来，各地坚持应用为王的原则，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场景，不断向教育核心业务领域和社会公共服务场域延伸渗透，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探索。目前，依托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已大规模

普及态势。随着平台应用深入发展，过程性数据持续累积，数据要素作用不断彰显，即将迈向数据驱动的教与学变革、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并为重塑未来教育新形态积蓄力量。

面对数字教育转段升级的关键节点，教育部党组聚焦教育强国建设，统筹谋划、因势利导，启动实施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应用典型案例推荐遴选工作，发挥评价引领、典型引路作用，从鲜活实践中发现规律、提取经验、形成示范。

按照部党组部署要求，中国教科院紧密对接教育部教育数字化专家咨询委员会，研制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应用典型标准，组织专家开展案例遴选，选出了一批优秀典型案例。这些案例生动展现了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用实践证明了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驱动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教育强国建设的战略支撑作用。

今年是数字教育“扩优提质年”，各地要持续深化国家智慧教育平台应用，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新，推动国家数字化战略行动取得新突破。

第一，坚持正确导向。各地要秉持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理念，深化国家平台应用，推动数字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创新，系统培养师生数字素养与技能，支撑引领教育强国建设，办好人民满意教育。各地要围绕解决教育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难点问题，创造性提出解决方案，以国家平台深度应用引领数字教育发展新理念、新体系、新内容、新模式、新治理，构建数字时代的教育新形态。

第二，加强联结贯通。对于教育数字化来说，联结就是力量，才能将诸多典型应用、资源内容等“珍珠”串成“项链”。各地应遵循综合集成、体系贯通的思路，积极参与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体系化建设，研究开发优质教学资源 and 工具，推进各级各类平台互联互通，努力向国家平台贡献资源。各地各校需进一步加强资源协同创生、开放共享，形成资源建设与用户应用的闭环，发挥国家平台“抬高底部、激活头部”的作用。

第三，突出创新应用。检验数字教育发展成效，应用是唯一试金石。典型案例的引领性和示范性，主要通过开拓式应用场景和创新型应用模式展现。各地各校要不断推动国家平台现有场景全面落地，探索平台应用的场景创新，深入挖掘国家平台沉淀积累的海量数据，发挥数据要素在推进教育业务协同和流程优化、赋能规模化因材施教中的核心作用，以国家平台创新应用引领数字教育变革。

第四，注重整体推进。教育数字化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兼顾、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各地各校需根据实践情况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强化领导小组、工作专班和专家团队等组织保障力量，构建制度体系，筑牢数字基座，完善应用环境。各地应以国家平台的常态化应用为抓手，带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整体推进，全面培育支撑数字教育发展的良好生态，助力实现数字时代的教育系统性重塑和整体性重构。

在建设教育强国征程中，我们要把教育数字化作为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深入推进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的大规模创新性应用，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教育数字化发展道路。（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2

☆ 教育教学研究

指向高质量发展：科学教育评价价值取向和路径优化

钱佳 崔晓楠 代薇

一、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科学教育评价价值取向的应然选择

教育评价不只是一个“评”的纯粹技术活动，更是一个“价”的指引性活动。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关乎教育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它的生成必定以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现实参考，并隐藏于实践行为的背后。现阶段科学教育呈现出三大发展路向，应以此作为科学教育质量话语的逻辑原点来思考科学教育评价的应然价值取向。

(一)导向革新:以育人为本的底层逻辑为坐标参照，回归育人本义

“底层逻辑”是指从事物的本质、底层出发，思考事物背后不变的价值取向，并以此为起点寻找实践路径的思维方法。明确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能够从根本上掌握科学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当前国际公认科学教育的价值是“通过科学学科的学习达成育人的目的”，而不再只是“通过教育达成科学的目的”。在我国，科学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提升学生科学核心素养，旨在促进学生的好奇心、兴趣、探究欲和科学思维方法，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因此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是“培养高质量的人才”，这就要求科学教育评价要回归育人本义，遵循如下两条基本理念。

一是突出评价目的的育人性。科学教育评价要改变以往选拔式的目的，引导学生摆脱反复刷题和机械训练，走向科学探究实践，促使科学教育评价回归其育人的基本属性。具言之，科学教育在教育评价目标改革上要实现从基于科学类课程标准的测评向基于学生科学核心素养的综合测评转变，特别是注重对育人过程即培养学生创新创造思维的评价。

二是注重评价内容的全面性。高质量的科学教育以提高学生的科学核心素养为最终目标。那么，在评价内容上，既要观照科学教育对学生科学知识、科学技能的传授效果，也要观照对学生科学观念、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的培育是否进行价值引领，从而全面反映科学教育的育人目标是否有效达成。

(二)理念嵌入:以“共性+个性”的逻辑为内核基础，契合全纳拔尖

依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任何事物都是包含着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体，教育评价也不例外。教育评价对象具有复杂性的特点，既存在一般的共性，又存在个体的个性，当关注其共性时，需要“一把尺子衡量”的统一评价，当关注其个性时，需要“多把尺子衡量”的分类评价。在科学教育评价中，所谓的共性是指科学教育评价要遵循一般性、普遍性的规范，而这种基于共性逻辑的评价强调面向所有评价对象的统一性，属于底线性要求，能够给予他们整体性的关照。另外，科学教育评价的个性逻辑则强调要承认并尊重评价对象的差异性，并认为评价最终的落脚点在于充分彰显评价对象的优势特征，打破“集体平庸”，最终达成“各尽其才”的目标。这是因为学生家庭背景、兴趣天赋、性格特征各异，科学教师任教的科目、承担的职责存在差异，学校类型、学校区位、学段特征各有不同。因此，把握好科学教育评价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实现两者的有机平衡，成为优化科学教育评价的关键要点。与此同时，当前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处理好教育质量与公平的关系，那么，科学教育评价取向理应契合“全纳与拔尖”的培养要求，秉持共性与个性并重的原则，不仅要考虑一般评价对象的共性情况，也要考虑具体评价对象的个性化情况。这就要求在评价时既要用“一把尺

子保公平”，即基于统一评价面向所有评价对象，抓住共性问题，更好刻画全体学校、全体教师、全体学生的科学教育发展全貌，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又要“用多把尺子促个性”，即基于分类评价，关注教育评价对象的个性化特征，创设多样化的评价标准、评价方式，为他们提供个性化成长的“冒尖”渠道。

(三)难点突破:以多方协同的共治逻辑为基本立场，实现价值共商

评价主体广泛而深度的参与是评价过程和结果满足各利益主体需求的前提。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指出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不再是传统制度逻辑下教育行政系统一元主导，而是现代制度体系下党委和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等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这为新阶段我国科学教育评价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这就要求在评价实践中，坚持多方协同的共治逻辑，承认并尊重政府、学校、学生、家长等多元主体的地位，坚持多元主体“全面参与”“协商对话”的评价理念，推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科学教育评价。在科学教育评价中的多方协同，能够有效满足各方的差异化诉求，调动他们组织与实施科学教育的积极性，从而为科学教育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人力与资源支持。反观当前的科学教育评价实践，各主体的参与程度不均衡，参与潜能也尚未完全激活。一是就对学校和教师的科学教育评价而言，党和政府、教育部门更多地参与到评价的过程中，制定标准并进行考核，而学校和教师自评基本被排斥在科学教育评价主体之外，更遑论学生、家长、科学家等主体了。二是就学生科学素养评价而言，学校、科学教师通常担任评价的主导者，而作为科学教育主体的学生常常“缺位”，不仅欠缺参与评价的机会，而且缺少参与的主观意愿。因此，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科学教育评价应改变各主体参与的不均衡性，以多方协同的共治逻辑追求多元主体的评价优势，挖掘多元评价主体的群体智慧，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和客观性。

(四)重心转换:以动态生成的发展逻辑为动力引擎，助力增效提质

评价最重要的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发展与改进。教育评价不能只简单地满足于对被评价者过去的准确判断，更需要对他们未来的价值指引，这集中体现为教育评价的发展性要求。在科学教育评价的实践中，应坚持动态生成的发展逻辑，强调根据一定的科学教育目标，运用发展性的评价技术和方法，对学校科学教育活动进行评价，从而使学校、教师、学生能更清晰地识别问题并找到努力方向。因此，一方面，坚持动态生成的发展逻辑要求在评价时以发展的眼光和发展的视角去看待科学教育效果，更加强调学校、教师、学生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程度。例如，在对学生科学素养进行评价时，要按照尊重差异、重视起点、关注过程、强调发展等原则，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对学生在接受某一阶段科学教育后的科学素养增值程度进行客观测评和价值判断。在这一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学生的实际情况，始终看到学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关注学生科学素养的“增值”或“净效应”。另一方面，坚持动态生成的发展逻辑强调对科学教育质量的改进，反映出为发展而评价、以评价促发展的价值取向。在这一层面上，就是积极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牵引科学教育领域的课程建设、教学实践、学生培养等方面，实现科学教育质量的跃升。《意见》中强调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并描绘了高质量科学教育的新样态，即在学校中要实施思维和素养导向的科学实践与体验式教学，开展基于科普场馆与核心素养的主题课程与探究实践，整合优化与协同发展校内外科学教育资源，打造多方协同的科学教育生态体系。因此，对照《意见》提出的要求，当前推进科学教育评价工作的优化，就是要结合上述科学教育的特征来构建包含课程教学、教师发展、学校管理、学生发展在内的科学教育评价体系，以此推动学校不断完善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加强教学管理等，形成“以评促改、以改促建”的良性循环通路，实现科学教育

的变革发展。

二、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科学教育评价的路径优化

实现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科学教育评价作为支撑。2023年12月,教育部启动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实验校建设项目,并以此为契机推动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届时应以高质量的科学教育评价引领科学教育发展。对照上述科学教育评价的价值取向,当前优化科学教育评价需要从做好评价内容的加减法、制定兼顾共性与个性的评价标准、构建多主体的评价生态、加强科学教育质量监测等方面着手。

(一)做好评价内容的加减法,构建科学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当前,科学教育评价已由学生素养的阶段测评转向综合评价学校科学教育工作的深化阶段,包括国家科学教育质量监测、科学教师考核评价、学校科学教育质量评价等层面。不过,整体而言,现阶段科学教育评价内容的关注点多放在结果性和结构性评价指标上(包括学生科学成绩、科学教师规模、科学教师专业资格),较少关注过程性指标(如科学类课程、科学学习氛围),评价指标结构相对不合理。未来,应做好科学教育评价内容的加减法,减少对结果性和结构性质量的评价,增加过程性评价指标,建构合理的科学教育评价指标体系。

一是就学生评价而言,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核心素养,意味着不再简单地追求学生科学成绩的提升和科学知识的掌握,更加重视学生创新思维以及个性化的发展,强调理性精神指导下的求真求实。对此,科学教育评价内容要减少机械性、重复性、低水平的考试内容和形式,将科学兴趣、科学信念、实践能力、创新潜能、跨学科学习能力等过程性内容纳入评价指标体系,进而获得对学生科学素养发展全景式的评价。

二是就教师评价而言,应增加基于学科素养的评价内容。当前我国的科学教师的考核评价主要集中于立德树人等通识性素质,未来应完善基于学科素养的科学教师评价指标,更加注重对育人过程特别是培养学生创新创造思维的评价,从而判断和引领科学教师素质和教学能力的提升。

三是就学校评价而言,不应只关注学校科学教育实施的硬件条件和经费投入,而是更全面关注学校科学教育工作。对此,依据《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方案》等文件精神,要把学校科学教育统筹保障体系、科学类课程建设情况、实验探究教学实施情况、科学活动资源拓展情况、学生多元评价情况等综合纳入学校科学教育评价指标体系。例如,将学校科学类课程开设情况、实验教学情况等纳入教学视导和日常督导,对不按规定开足开齐开好科学类课程、开展实验教学等问题的学校要求整改;定期监测科学教育教学装备的配置情况和使用情况,做到有教学装备可用、实用、易用。

(二)制定科学教育评价标准,实现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教育评价标准是教育评价应遵循的价值准则,是对评价对象质量要求的具体规定。教育评价标准直指“计划中规定达到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制定科学教育评价标准应立足于当前科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契合共抓全纳拔尖的要求。为此,一方面要坚持“共性”的发展逻辑,构建一般性、全国性的科学教育评价标准。要将党和国家的科学教育方针政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科学教育的要求转化为评估标准,制定国家层面的科学教育质量评价标准,确保全国范围内科学教育质量评价标准具有统一性。这种标准是指所有教育评价对象必须达到的最低合格标准,是一种底线要求,体现出国家对科学教育发展的一般性要求。1996年,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发布《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从“评价与所支持决策的一致性”“评价应关注学习科学的成绩和机会两个方面”“评价技术与决策和行动的吻合性”“评价行为必须公

正”“根据评价结果就学生成绩和学习机会所进行的推论必须坚实”五个方面制定全国性具有普遍指导性作用的科学教育评价标准体系。

另一方面要坚持“个性”的发展逻辑，构建特殊性、区域性的科学教育评价标准。换言之，不同地域空间条件、不同学校性质、不同教师和学生发展阶段下的评价标准既要蕴含普适性规范要义观照其整体布局，还需体现不同评价对象的个性化、具体化价值尺度。一是就宏观路向而言，应遵循“先国家一后地方”的路径制定区域科学教育评价标准。由于我国各地的科学教育发展水平各异，各地可在“不低于”国家科学教育评价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细化评价标准，并配套当地的科学教育课程标准、科学教师准入标准等，设置三级指标，对每个指标进行权重赋值，给出具体解释和评价范围。二是就微观主体而言，要着眼于具体学段和学科制定差异性评价标准，增强评价标准的针对性与適切性。例如，不同学段学生的科学教育评价标准应有差异，并兼具衔接性，小学应注重评价学生科学思维的启蒙和科学兴趣的感知，初中应注重评价学生科学知识的掌握情况、科学探究能力的养成情况，普通高中要注重评价学生科学思维、科学精神的培养情况。三是就内容指标而言，要将增值效果纳入评价标准，凸显个性发展。要遵循当前学生科学素养发展水平与未来发展潜力相互补充的原则，注重学生进步的增幅，强调学生发展状态的纵向比较，考察学校或教师对学生科学素养发展影响的净效应。

（三）优化科学教育评价治理，打造多主体的评价生态

教育评价与教育治理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即教育评价需要教育治理的眼光，教育治理亦需要教育评价的视角。据此，科学教育评价不能仅仅关注评价内容、评价标准等方面的改革，更应将科学教育评价本身作为治理对象来看待。当前教育评价治理亟须构建起政府、学校、教师、学生、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格局，以不同主体参与产生的评价效果最大化促进科学教育高质量发展。

第一，相关政府部门应充分发挥好主导作用，借助政策、资金及舆论引导科学教育评价朝向科学化、公正化的方向发展，将科学教育的实施情况作为考核学校的重要指标。例如，向学校派遣督导组或考核组，对学校科学教育的政策落实与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导，以确保科学教育政策在学校层面的精准落实。

第二，学校要积极开展定期的科学教育质量自我诊断，根据《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普通高中学校办学质量评价指南》以及各地颁布的《办学质量评价实施方案》，以文件中的指标体系主要维度和具体考查要点系统考核本校的科学教育活动与产出。

第三，学校应制定多元评价主体参与科学教育评价的实施办法，吸纳教师、学生、家长、社会组织等不同主体共同参与评价过程，共享和共商评价结果。例如，教师从开展科学教育的活动内容和形式、活动目标的达成、学生的科学素养提升等方面，家长从家庭科学教育氛围、资源数量等方面，社会组织从校外资源利用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的科学教育评价，同时学生以自评、他评、互评的方式对科学素养掌握情况进行评价，并加强学生对教师、对课程的评价。

（四）坚持科学教育质量监测先行，强化监测结果应用

科学教育质量监测是反映、预测区域或者学校科学教育发展与变化的重要载体，优化科学教育评价要坚持监测先行。为此，一方面，要加强科学教育质量监测。一是制定学段衔接的科学教育效果测评方案。当前国内大多数科学素养监测仅面向固定年级，多为四年级和八年级，尚缺乏官方的覆盖全学段、全年级的监测体系。基于此，应根据各学段科学教育目标的具体要求，构建兼顾学段差异与衔接的、面向全年级的科学教育效果测评方案。二是定期

对学生科学素质进行分析研判。建立周期性的动态监测机制,绘制学生科学素养的图像,实现对学生科学素养的长期追踪和全面分析。例如,美国的“国家教育进展评价”在2014年和2018年针对全美八年级学生的技术与工程素养进行测评,追踪学生的科学素养变化情况,为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提供循证依据。

另一方面,要加强对监测结果应用。第一,推进评价结果的公开公示,切实保障多元主体对评价结果的知情权。要畅通科学教育评价结果反馈渠道,依托数字技术构建自下而上的反馈渠道和自上而下的回应平台,保障评价结果反馈工作更流畅、更高效,从而在各主体的动态反馈与交流中促进科学教育工作的改进和质量提升。第二,加强对评价数据的深度挖掘。深度挖掘关键因素,特别是进行一些推断统计与相关分析,探讨到底哪些因素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学生的科学素养,从而力求探寻学生进步的机制,找到改进工作的突破点。例如,有研究者基于2017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数据的研究发现,实验教学对学生的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探究能力和科学学习兴趣都起到促进作用。类似这些聚焦于建立教师教学与学生科学素养之间关联的分析可以为科学教育教学实践提供有力指导。

摘自:指向高质量发展:科学教育评价价值取向和路径优化 《中国教育学刊》2024年第4期

教材建设要做到“五个坚持”

吕建晴

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切实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教材作为文化传承发展的重要渠道,是铸魂育人的重要依托,是事关未来的战略工程、基础工程。加强教材建设,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可以有效保障中华文脉弦歌不辍,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坚持科学融入,做好“第二个结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

加强教材建设,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在教材中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有效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让马克思主义在青少年心中牢牢扎根,保持马克思主义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重要途径。二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要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强大的理论说服力、价值引领力、历史穿透力和现实指导力,是打开青少年学生成长成才大门的总钥匙。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到有机、完整、科学、准确。三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在教材中讲清楚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来源不同,但是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正因彼此契合,方可有机结合。要在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语境下,增进青少年对马克思主义的亲近感、认同感、归属感,促进马克思主义在新一代学生群体中广泛传播。

坚持培根铸魂,培养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青少年阶段正值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思想既是炽烈的,又是稚嫩的,往往从教材中学什么,就会信什么,继而用什么、做什么。“培根”,培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重在增强青少年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铸魂”,铸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重在激励青少年立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新时代的精品教材建设,一要体现国家和民族价值观。具体来讲,教材应该讲清楚中国

人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二要在教材中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材内容的选择应该坚持主线主脉，述录先人的开拓，启迪来者的奋斗，帮助青少年打好中国底色、厚植红色基因、树立高尚情操、坚定远大目标。三要以先进的育人理念引领教材建设。帮助青少年坚定“四个自信”，为源源不断地培养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坚持自信自立，增强文化主体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铭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遗传因子。

加强教材建设，一要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作为教材的背景色，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做好分类建设，重点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精彩篇章，讲清楚中国有什么样的文明和是什么样的国家，展现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和人文底蕴。二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注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去粗取精、提炼概括，将其中的优秀成分甄别遴选融入教材体系，实现活化再生。着力探寻传统文化、知识内容、时代追求的交汇处与链接点，在教材中做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点呈现与弥散泛在的有机统一。三要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注重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党的百年奋斗史，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锻造新理论，系统梳理中国伟大成就和经验，凝练形成标识性概念、原创性范畴、特色性理论和中国式话语，并及时反映在教材体系中。

坚持凝心聚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材是民族领域的重要思想阵地。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青少年时期是祖国观、民族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加强教材建设，一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根本目标。在教材中，要充分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黏合剂作用，讲清楚 56 个民族都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讲清楚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历史的主流，统一性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二要充分体现各民族相互欣赏、相互学习。教材要为学生传达出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行不悖的理念，加深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心灵深处，让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团结在祖国下一代的心田生根发芽。三要坚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对各民族传统文化不能原封不动地接收，更不是连同糟粕全盘保留，而是要不断推陈出新、古为今用。开展教材建设，不能“扔进篮子都是菜”，而要做到“提着篮子去选菜”，真正让各民族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让教材成为传承创新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

坚持胸怀天下，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世界上多姿多彩的文明如同一朵朵美丽的花儿，中华文明也是其中无比鲜艳的一朵，都是人类文明创造的成果。当下的中国正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拥抱世界，与不同文明广泛开展交流互鉴，为加强教材建设提供了丰富素材。

加强教材建设，一要吸收海外教材建设先进经验。继续保持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将国外高水平教材作为“引进来”的优先选择；引进不同的教材建设方式，积极吸收世界教材建设先进理念、先进技术，做到洋为中用；大力引进教材建设标准，借鉴其他国家高质量的教材建设标准，以人之长，补己之短。二要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要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在教材中传达出用文明交流交融破解“文明冲突论”的价值取向，为

人们提供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携手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各种挑战。三要推动本土优质教材走向世界。从某种意义上讲，教材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闪亮名片，教材“出国”已成为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提升的重要标志。要积极推动中国教材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用中华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以中国话语阐述中国智慧，让中国教材传播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19

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构建现代化中国特色教材治理体系，关键就是通过集权和分权两种方式理顺中央、地方与学校不同层级的关系，优化国家、社会与市场三大主体关系，促进教材建设在治理主体、方式、机制、结构等方面的重构和改革。只有积极探索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有效路径，才能破解教材管理制度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回应新时代建设高质量教材体系的新要求。

（一）落实国家事权，构筑教材治理的善治格局善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评估标准和理想目标，是一种科学有效、协调有序、配合适当的理想状态。实现教材善治，就是要改革传统教材管理体制，构建高效、公平、法治、民主的现代化教材治理体系，也是教材治理现代化追求的理想目标。教材治理现代化改革是一个价值导向优先于技术理性变革的过程，教材建设的价值导向从根本上决定着教材治理方式、治理机制、治理结构的路径选择。因此，明确教材治理的政治方向与价值目标，准确把握新时代课程教材的育人目标，是教材治理达致善治目标的重要前提。首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明确教材治理的方向和目标。教材建设国家事权是对新时代我国教材建设的价值定位，表明教材建设体现国家权力意志。国家从战略高度整体规划和统筹治理，为我国教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指明了方向。只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目标方向，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教材治理中的指导地位，才能推进教材建设权力的有效运行，确保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真正落实。推进教材治理现代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党和国家的教育要求贯穿到教材治理全过程各环节，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传统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融入教材治理的各领域全链条，充分发挥党对教材治理工作的领导作用。其次，以新时代育人目标为主线，推进中国特色教材治理体系建设。教材治理体系是中国特色教育制度的组成部分，为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落实提供了制度保证。教材治理是落实新时代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任何教材治理行为都要尊重教育本质规律、指向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时代落实人才培养目标是学校教育的根本任务，学校教育承担着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新要求、实现“五育并举”和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因此要把新时代育人目标融入教材编写审查、出版发行、选用使用各环节和教材治理目标、机制、体制、结构等各要素中，以推进中国特色教材治理体系的建构，彰显教材建设作为国家事权的本质内涵。要坚持育人为本的价值原则，避免市场逐利性带来的负面影响，推进相关教材治理主体价值观念的转变，坚守教材治理的育人本质。

（二）分层分类推进，实现教材治理的多元共治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是现代治理的核心特质。多元共治、协同治理是教材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标准。实现教材治理现代化需要构建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相互配合、协作对话的教材管理系统，形成从国家、地方到学校共同参与的、多层多类的组织体系。多元共治的关键在于重构教材管理体系，通过集权和分权两种

方式调整多元主体在教材治理中的权责关系，构建由国家主导统筹、地方和学校多层级参与的教材治理体系。因此，要提升国家的宏观教材治理能力，明确各级教材治理主体的职责，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是实现教材治理多元共治的重要途径。第一，国家要提升宏观教材治理能力，并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国家要立足科教兴国、人才强国的战略高度，加强教材制度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研制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和基础性的重大教材政策，完善教材治理的政策法规与制度规范，推进大中小学课程标准体系一体化建设，加强意识形态属性较强学科教材的编写审查工作。同时，国家要注重顶层设计与基层创新相结合，为地方和学校开展教材建设提供充分的决策权、话语权与改革创新空间，形成纵向衔接、良性互动、协调一致的教材治理系统。师生是教材的使用者和实践者，对学科教材使用有鲜活经验和切身感受，能对教材使用效果做出及时反馈，因此，应鼓励地方、学校和师生共同参与教材治理，自下而上地进行实践创新，发挥地方、学校的自主性和专业性，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第二，加强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教材治理能力，健全地方教材管理制度。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负责在本地落实国家教材管理政策方针，制定地方教材管理规划政策，引导学校教材建设与管理工作。进言之，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要整体系统地规划地方教材建设，以国家课程标准及教材规划政策为指导，因地制宜地制定地方教材管理规划；要吸收本地学校校长、教师、专家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教材治理，有步骤、有计划地推进地方教材建设，健全地方教材管理制度，完善教材编写、审定、使用、评价的地方治理规范；要开发聚焦国家课程目标、具有本土特色、满足学生需求的地方教材，指导监督本地学校教材管理工作，在实践中探索形成地方教材治理的成功经验与案例。第三，激发学校参与教材治理的主动性，完善校本教材管理制度。学校要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负责落实国家和地方教材管理政策文件，并依据本校实际情况，推进国家课程教材和地方课程教材的使用选用工作，创造性地开展校本课程教材的开发、审核和管理工作；要设置专门的教材管理部门，组建专业教材管理团队，健全教材管理规章制度，完善教师、学生、家长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教材治理的制度；要发挥一线师生熟悉教材使用实际情况的优势，做好教材使用的质量评估与意见反馈工作，切实提升各类教材质量。

（三）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教材治理的法治路径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本质是破除滞后的教材管理的体制机制，建立和完善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的教材管理体制机制。实现教材建设的法律之治是保证教材治理多元共治和实现教材治理善治格局的前提。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教材治理的法律法规，构建科学规范的教材管理体制机制，推进国家层面教材管理权力的横向拓展，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等不同主体的参与作用，把教材建设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另一方面，要增强治理主体的法律意识，加强教材制度设计与制度实施，推进依法治教。

第一，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完善教材管理的法律制度。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完善教材规章制度，加强教材管理的过程监控，发挥教材制度的价值导向、科学决策和制约监督的功能等方面，具体包括完善各级各类学校教材管理的法律制度、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社会组织的专业服务及评估机制等。此外，在推进大中小学教材一体化建设的战略背景下，政府还需优化教材编写审核、出版发行、选用使用等制度的实施流程，明确各类治理主体的法律责任与规范制度，建设纵向衔接、横向关联、贯通一致的课程标准体系，形成一套衔接

流畅、相互联动的教材管理机制，保障管理过程中信息畅通和组织资源的有效利用，以促进教材建设依法有序、高效公平的发展。

第二，发挥相关专业组织的作用，建立第三方评价监测的制度体系。教材建设的社会性参与是建设中国特色教材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组织介于国家宏观层面与学校微观层面之间，可以弥补政府监管不足的问题，为政府的宏观规划和整体布局提供有效的专业支持。如国家教材委员会承担着对国家教材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和全面指导、对意识形态属性较强的教材进行审核的任务。《中小学教材管理办法》指出：教材编写单位“有对教材持续进行使用培训、指导、回访等跟踪服务和研究的专业团队，有常态化质量监控机制，能够为修订完善教材提供持续、有力支持。”“如需更换教材版本，应由教材选用单位委托专业机构征求使用地区学校教师、学生及家长意见，形成评估报告，并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可见，应完善教材监督的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积极发挥专业组织在教材评价监测中的作用，由专业组织研制教材评价标准、制定教材使用监测的制度规范，以进一步推进教材评价监测体系的法制化、规范化。

第三，完善市场竞争的法律规制，提升教材治理效能。在政府宏观指导下，利用法律手段，进一步完善市场准入机制、市场竞争机制，通过市场竞争调动多元主体参与教材建设的主动性，发挥市场调节手段在教材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较大，出版发行量大，且教材比普通图书的利润高，因此大批出版社、图书商进入教材教辅出版市场导致教材市场竞争激烈；另一方面，教材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其制作和发展过程具有一定程度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不能完全由市场竞争机制所决定。因此，教材治理应遵循政府宏观调控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政府应通过系列的法律规制，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和优化市场环境，调动教材多种利益主体参与教材建设，形成多主体、多部门协同联动的工作机制，把教材制度优势转化为教材治理效能，实现教材管理提质增效的目的。

摘自：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标准与路径 王攀峰 文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4 年第 2 期

教学主张：名师成长的新动能

赵连杰 朱宇欣

什么是名师的教学主张？名师为什么需要教学主张？名师如何提炼教学主张？认清这些基本问题有助于教师对其进行结构化理解和系统性思考。

近年来，各地为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关于实施新时代中小学名师名校长培养计划（2022—2025）的通知》《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计划》等文件精神，有关名师成长机制与规律的探索方兴未艾。凝练教学主张现已成为推动名师持续成长、超越自我的新动能。

相较于国外教育领域的教师实践知识、个人教学理论和教学信念等，教学主张是一个颇具中国特色的本土概念。名师的教学主张是名师基于对学科本质以及育人观念的深刻理解而形成的关于学科教学的独特见解和理性认识，是名师对教学实践经验的理性升华和概括之后形成的具有个人辨识度的学科教学价值观。

名师为什么需要提炼自己的教学主张呢？

首先,提炼教学主张是名师进一步明确学科教育价值观的需要。价值观对教师教学行为的驱动和引领作用不言而喻。教学主张作为一种教学理念和指导原则,不应止步于“术”和“技”层面的方法和策略探索,更应凸显对学科教育本质的理解,体现对学科教育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名师通过深入总结和提炼教学实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能够更清晰地认识到学科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从而逐步明确自己的学科教育价值观。

其次,提炼教学主张是名师进一步提升教学效能的需要。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名师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学经验。丰富的经验让他们工作起来游刃有余、成效显著,但名师也容易因此而被经验所束缚,曾经引以为自豪的教学经验有可能成为阻碍名师进一步提升的桎梏。教学主张能够帮助名师将相对零散、模糊的日常教学经验进行概念化、抽象化以及理论化的深层次改造,使教学经验从日常概念形态走向科学概念形态,从而为教学效能的提升奠定学理基础。

再其次,提炼教学主张是名师进一步提升专业影响力的需要。名师虽然获得过各种荣誉,有耀眼头衔的加持,但如果在专业发展上没有学术引领的辨识度,没有专业精神和学术追求的归宿,也很难产生专业和学术上的影响力。教学主张是名师提升专业影响力的重要路径和手段,是名师在学科教学领域给自己树立的一面旗帜。具体而言,教学主张能够体现名师在教学实践中的独特见解和教学风格,凸显其对教学的独特认知与实践,从而获得同行的关注与认可。此外,教学主张还能够为名师在教学研究、学术交流和教育改革等方面注入灵魂,有助于树立自己的专业形象,进一步提升其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

名师提炼教学主张,可以通过归纳、演绎和综合三种路径来实现。在归纳路径中,名师可以通过总结、整合和提炼教学实践经验,逐步构建教学主张。例如,李吉林老师的“情境教育”便是通过归纳路径提炼教学主张的范例。在演绎路径中,名师依据教学的一般原理,将其应用于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从而认识到教学原理性知识的特殊性。例如,张齐华老师的“文化数学”就是采用演绎路径生成教学主张的样例。综合路径则是以上两种方式交叉融合的结果。名师可以在综合考虑各种条件的情况下,确定选择适合自己的教学主张提炼路径。

需要说明的是,无论选择哪一种路径,都需要注意四个问题:其一,需要深入思考和审视自己的教学价值观,明确自己的教学信念,不断追问和自省关于学科教学的本质理解,为提炼教学主张奠定基础。其二,需要有机整合自身的教学经验、理论视野及学科特点等,并积极关注国家关于课程与教学的政策要求。其三,可以借鉴其他名师的成功经验和教学理念,从中汲取智慧和启示,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教学主张。其四,名师要深刻把握教学主张的动态性和发展性,认识到教学主张的提炼并非一劳永逸,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不断接近教学主张的本质。总之,教学主张的提炼是一个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动态发展的过程,需要名师精益求精、持续发力。

高质量教师队伍建设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工程。名师作为高质量教师队伍中的佼佼者,提炼教学主张并围绕其开展系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是专业发展的重中之重,是教学名师实现从优秀走向卓越“二次成长”的重要法宝。名师作为学科的领军人物,在教学中扮演着示范和引领的角色,通过提炼和完善教学主张,名师可以更好地展现自己的专业水准和个性魅力,真正起到引领作用。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26

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评价是应时之举

徐文静

日前，北京市教委公布 2024 年度推进首都教育数字化转型重点工作，提出将数字素养作为教师职业生涯的基本要求并纳入教师评价体系。

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对其自身专业发展至关重要，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学生学习效果和未来竞争力。将数字素养纳入教师评价体系将充分发挥教师评价的激励和导向作用，不仅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同时也为落实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重要支撑。一方面，这有利于激发教师的内驱力，将时代要求和现实需求转化为教师发展的内在动力，促进教师努力提升数字素养，以实现个人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为学生树立终身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教师通过提升个人数字素养，可以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改进教学方式，发挥数字技术赋能优势，构建个性化教学模式，深化因材施教，进而提高教学质量。

当下，教育数字化战略深入推进，教师的数字素养是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但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以及传统教育教学理念、模式和方法在教师思维中根深蒂固等，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数字化教学的积极性不高，对数字教育资源的开发和应用能力较低，对新的数字教育理念和教学模式存在畏难情绪和抗拒心理等，都将会影响教师数字素养的提升。

面对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浪潮，数字素养已成为教师的“必修课”，如何上好这门“课”，需要政府、学校、教师等多主体共同发力。

政府要扮好“指挥者”角色。在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道路上，只有指挥精准、方向明确，才能驶入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快车道”。为此，政府要加强政策引导，提供专项资金和人力资源，加大对数字化校园的投入力度，为提高教师数字素养提供基本保障。如升级改造硬件设备，夯实数字化校园网络基础，优化信息软件及资源库建设，推进教学软件的实施应用。

学校要扮好“设计者”角色。在提升教师数字素养的道路上，只有描画好“路线图”，细化好“施工图”，细心培育，用心扶持，才能跑出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加速度”。一方面，学校应统筹规划学校的数字化发展，优化校园环境，营造有益于教师数字化转型的教学文化；另一方面，加强校本培训，根据教师年龄、学科和数字化水平的不同开展分层研训，组建以青年教师为引领的数字化研修队伍，以点带面实现教师数字素养整体发展。此外，进一步完善教师评价体系，增加数字化教学能力在评价体系中的比重，细化不同类别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评价指标，分层分类精准评价，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改。同时，建立创新奖励机制，表彰在数字教育方面作出创新贡献的教师，鼓励更多教师加入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中。

教师要扮好“践行者”角色。教师是数字化转型的主力军，只有教师主动发力，才能打通数字化转型新征程的“最后一公里”。为此，教师要积极学习和掌握数字技术，转变观念、角色，逐渐从知识的传递者转向促进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和协助者；在日常教学中有效运用数字化教学资源，制定个性化教学方案，利用新型技术工具，变革教学模式，推动教和学习活动重构，并在反复实践中更好地适应、解决数字化教育带来的问题和挑战。

发展数字教育，推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发展所需、改革所向。教师数字素养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因素，提升教师数字素养，既是每一位教师的责任和使命，更是政府和社会应尽之责、应立之功。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4.4.9

☆ 国际视角

“术语”与“俗语”：即将离任的 IES 主管对教育研究的感悟

‘Jargon’ and ‘Fads’: Departing IES Chief on State of Ed. Research

Source: Education Week, April 28, 2024.

Just last month, Mark Schneider wrapped up his six-year term as the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At IES, he was charged with overseeing the nation’s education research efforts, including such well-known efforts as the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and the What Works Clearinghouse. Before assuming his role at IES, Mark was a vice president at the American Institutes for Research, commissioner at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and spent many years chairing the political science department at SUNY Brook. Having known Mark for many, many years, I was interested in his reflections on his tenure at IES. Here’s what he had to say.

就在上个月，马克·施奈德(Mark Schneider)结束了他作为教育科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所长的六年任期。在 IES，他负责监督国家的教育研究工作，包括一些众所周知的工作，如国家教育进步评估和什么是有效的信息处理中心。在加入 IES 之前，马克曾任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国家教育统计中心委员，并在纽约州立大学布鲁克分校担任政治学系主任多年。认识马克很多年了，我(Rick)对他在 IES 任职期间的感想很感兴趣。下面是这段采访的选段。

Rick: You’ve just wrapped up your tenure as director of th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Sciences. What’s the state of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Mark: When I was a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Stony Brook University, fights over resources often pitted the “hard sciences” against the social sciences. At faculty meetings, I would use James March’s observation that “God gave all the easy problems to the physicists.” That would lead to plenty of eye-rolling from everyone but the social science chairs and faculty. But the fact is that humans have far more agency than electrons, and so many of our most beautiful and parsimonious models crash and burn when tested against real-world data. Our work is difficult, and we need to face the reality that most of our ideas, hypotheses, and interventions will not stand up to empirical reality. Indeed, IES-supported interventions have a “hit rate” that hovers around 15 percent, meaning most things don’t work. Depressing, but that success rate is not much different from most other human-centered fields. Indeed, by some estimates, only 10 percent of clinical trials succeed.

Over its 20-year history, IES has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a standard “business model.” I summarize it as: “Five years, five million dollars, failure,” which reflects our standard grant length, funding level, and outcome. This may sound like an indictment of how IES has supported the education research “industry,” but we need to understand the reality we face. And we need to embrace the idea that “the only failure in failure is the failure to learn.”

Rick:你刚刚结束了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的任期。美国教育研究的现状如何？

Mark: 当我还是石溪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时，资源之战常常使硬科学与社会科学对立起来。在教师会议上，我会引用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的话：“上帝把所有容易的问题都给了物理学家。”结果遭到除社科系主任和教工之外的所有人的白眼。但事实是，人比电子有更多的能动性，所以我们许多最美、最节俭的模型在与现实世界的数据进行测试时都崩溃了。我们的工作很困难，我们需要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的大多数想法、假设和干预都经不起经验现实的考验。国际教育学会承认的干预“命中率”徘徊在 15%左右，意味着大多数措施都不起作用。令人沮丧，但这个成功率与大多数其他以人为研究中心的行业没有太大区别。举个例子，据估计，临床试验成功率也只有 10%。

在其 20 年的历史中，IES 开发并完善了一种标准的“商业模式”。我总结为：“五年，五百万美元，失败”，这反映了我们的标准拨款期限，资金水平和结果。这听起来像是对 IES 如何支持教育研究“产业”的控诉，但是个需要清楚面临的现实。我们需要接受这样的观念：“失败中的失败就是没学到啥。”

Rick: Given the challenges you've just sketched, how have you sought to shift IES efforts?

Mark: I have tried to push IES to change its standard business model. Most notably, there are now a growing number of large learning platforms—IES's SEERNet among them—that let researchers access large numbers of students, enable rapid-cycle experiments, and support more frequent replications. IES's mission is to determine “what works for whom under what conditions.” This can only be achieved by replicating work in different audiences as a routine part of our research. Of course, other sciences have supported replications for years. Many now face a “replication crisis,” in which other research teams—or even the research team that conducted the original study—cannot verify findings. We have not been pursuing replication work long enough to generate a replication crisis in our field, but I look forward to that day.

The field is also beginning to face the problem that even after we identify practices and programs that “work,” we do not scale those interventions by moving from, say, 200 students in an experiment to 2,000 students in a school district to 2 million students in the nation. Without paying far more attention to scaling, we will never affect enough students to achieve our goal of creating a strong democratic citizenry capable of earning family-sustaining wages.

Rick: 鉴于刚刚描述的挑战，你是如何寻求改变 IES 的努力的？

Mark: 我一直在努力推动 IES 改变它的标准商业模式。最值得注意的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大型学习平台——IES 的 SEERNet 就是其中之一——让研究人员能够接触到大量的学生，实现快速循环的实验，并支持更频繁的复制。IES 的使命是确定“在什么条件下对谁有效”。这只能通过在不同的受众中重复工作来实现，这是我们研究的常规部分。当然，其他科学多年来一直支持重复实验。许多人现在面临着“复制危机”，即其他研究团队——甚至是初始研究团队——无法重现结果。我们从事复制工作的时间还不够长，不足以在我们的领域产生复制危机，但会有那一天。

另一个面临的问题是，即使我们有“有效”的实践和项目，也没有扩大这些干预的规模，比如，从一个实验中的 200 名学生到一个学区的 2000 名学生，再到全国的 200 万名学生。如果不更多地关注规模，我们将永远无法影响到足够多的学生，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即创建一个强大的，有能力养活家庭的民主公民群体。

Rick: As director, what's been your biggest frustration with the education research community?

Mark: Education science, like many disciplines, is overly affected by jargon and fads. We are an applied science charged by law with helping legislators, educators, parents, and students understand what we are saying and how to join us in implementing changes. But we often fail to translate our work into plain, accessible English. I have tried to impose several policies to make IES's publications and reports more user-friendly—for instance, by

imposing a 15- page limit on our reports. But perhaps the biggest indictment of the field is that the writing in education research reports, including IES's own, is often amazingly poor.

“Short sentences. Strong verbs.” That's the approach I ask people to bring to their writing, yet we rarely hit the mark. Perhaps the problem is that so many IES staff and contractors have Ph.D.s, so they think a greater number of poorly crafted reports is better than fewer tightly focused ones. As a result, our journals drip with incomprehensible jargon and big words that signify little.

Rick:作为主任,你对教育研究界最沮丧的是什么?

Mark:教育科学,像许多学科一样,受到术语和流行的过度影响。我们是一门应用科学,被法律规定负责帮助立法者、教育者、家长和学生理解我们所说的,以及如何加入我们实施变革。但是我们常常不能把我们的工作翻译得通俗易懂。我试图实施一些政策,以使 IES 的出版物和报告更显用户友好,例如,施加 15 页的限制。最大的问题是教育研究报告,包括 IES 自己的,往往是惊人的糟糕。

“多短句,强动词。”这就是我要求人们在写作中采用的方法,但我们很少能达到目标。也许问题在于,许多 IES 员工和合作方都拥有博士学位,他们认为,多写一些精心编写的报告总比少写一些重点明确的报告好。因此,我们的报道充斥着难以理解的行话和大词,突出甚少。

Rick: What kinds of changes could help on this count?

Mark: For several years, I have been pushing for the creation of a new center in IES focused on informed risk, high reward, and rapid-cycle research. Like the establishment of centers throughou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modeled on the 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or DARPA, the new IES center—currently called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Advanced Development in Education, or NCADE—would breathe life into a large segment of IES's research expenditures. The creation of NCADE would require an act of Congress.

We also need to continue updating the SEER principles. The Standards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 Research lay out some best practices that would guide the education science field to produce stronger work, plus some principles that are specific to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Should the next director continue to refine these, I believe that our field will be far better off than it was earlier in IES's life—and even more so when comparing the quality and the rigor of today's work with that of the pre-2002, pre-IES world.

Rick:在这方面做些什么改变会有帮助?

Mark:几年来,我一直在推动在 IES 中建立一个新的中心,专注于知情风险、高回报和加速周期的研究,类似联邦政府的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新的 IES 中心——目前被称为国家高等教育发展中心(NCADE)——将为 IES 的大部分研究支出注入活力。NCADE 的成立需要国会通过一项法案。

我们还需要继续更新 SEER 数据库原则。《教育研究卓越标准》列出了一些指导教育科学领域产生更强成果的最佳实践,以及一些专门针对教育科学研究的原则。如果下一任主任继续完善这些,我相信我们的领域将比 IES 成立之初要好得多——如果将今天工作的质量和严谨性与 2002 年之前、IES 成立之前相比,就更甚了。

Rick: You argue eloquently for new research centers within IES. But IES already has four of them. What makes you confident that a new one, NCADE, would fare any better? Put another way, why can't the existing centers just do the research that you'd ask NCADE to do?

Mark: This is the hardest question to grapple with when considering the need for NCADE. I sometimes think that if COVID hadn't punched a two-year hole in my tenure, I might have been able to make enough changes in

the culture and the practices of IES's two existing research centers to alleviate the need for NCADE. But changes in personnel, practices, and especially culture in a federal bureaucracy, even a relatively small one such as IES, are among the most persistent challenges any reform-minded leader faces.

I can document many barriers that are just hard to overcome. It is not surprising that a time-honored solution to such inertia is to create a new bureaucracy in which modern practices and new personnel can be brought in to drive new initiatives. On an abstract level, do we really need NCADE? Maybe not. But if we want to modernize and streamline education science research, NCADE is, I believe, the best and fastest way to bring about changes the field—and the nation—needs.

Rick:你很有说服力地主张在 IES 内部建立新的研究中心。但是 IES 已经有四个,是什么让你相信新的 NCADE 会有更好的表现?换句话说,为什么现有的研究中心不能做你要求 NCADE 做的研究呢?

Mark:在考虑是否需要 NCADE 时,这是个难题。我有时会想,如果 COVID 没有在我的任期内留下两年的空白,我可能已经能够在 IES 现有的两个研究中心的文化和实践中做出足够的改变,以减轻对 NCADE 的需求。但是,即使是像 IES 这样规模相对较小的联邦机构,人事、实践,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变化,都是任何具有改革意识的领导人面临的最持久的挑战之一。

针对许多难以克服的障碍,一个由来已久的解决方案是创建一个新的官僚机构,其中可以引入现代实践和新人员来推动新的举措,这并不奇怪。在抽象层面上,我们真的需要 NCADE 吗?也许不是。但是,如果我们想使教育科学研究现代化和流线化,我相信, NCADE 是改变这一领域和国家需要的最好和最快的方式。

Rick: You've made a priority of accelerating the speed at which we release federal education data and research. What's the problem and what's holding up efforts to do better?

Mark: The lack of timeliness is the single most common complaint that IES fields year after year. Many of these complaints come directly from Congress. Indeed, when the Senate HELP Committee a reauthorization of the Education Sciences Reform Act, the senators added a new paragraph about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commissioner with the same title: "timeliness." Our research centers, for instance, are largely focused on measuring how students grow and learn—which can take years. On top of that, we often fail to push for timely publications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once that research is complete.

Meanwhile, IES's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or NCES, has other problems that slow down the release of its work. Officials at NCES argue that they simply don't have enough staff to produce timely products. And maybe they don't. But they also do not seem to understand their audience's need for access to fast and reliable information.

Researchers like Marguerite Roza, Emily Oster, and Sean Reardon are helping to fill in the gap by standing up work that NCES could and should do. The signature example is how slow NCES has been in releasing critically needed information on how schools and districts are spending money. There will always be a lag between data collection after a fiscal year ends until it can be released—but the lag has often been years rather than months. I don't think that's a result of limited staffing. I think it's a result of limited vision.

Part of my push for NCADE has been to break the mindset of too many IES staffers and to bring in new blood committed to identifying critical shortages i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pushing for more rapid solutions, including greater sensitivity to the needs of research consumers—which would almost always mean faster turnaround.

Rick:你已经把加快我们发布联邦教育数据和研究的速度作为优先事项。问题是什么?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做得更好?

Mark:缺乏及时性是 IES 领域年复一年最常见的抱怨。其中许多抱怨直接来自国会。事实上,当参议院帮助委员会重新授权《教育科学改革法》时,参议员们增加了一个新的段落,关于每个专员的责任,标题相同:“及时性”。例如,我们的研究中心主要关注于衡量学生如何成长和学习——这可能需要数年时间。关键是,一旦研究完成,我们往往不能及时推动出版物和产品开发。

与此同时,IES 的国家教育统计中心(NCES)还有其他问题拖慢了其工作成果的发布。NCES 的官员辩称,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员工。也许他们没有,但他们似乎也不理解受众对获取快速可靠信息的需求。

像玛格丽特·罗扎、艾米丽·奥斯特和肖恩·里尔登这样的研究人员正在帮助填补这一空白,他们提出了 NCES 可以和应该做的工作。最典型的例子是 NCES 在发布学校和学区如何花钱的关键信息方面进展缓慢。一个财政年度结束后,从数据收集到数据发布之间总会有一段时间差,但这一时间差通常是数年而不是数月。我不认为这是人手有限的结果。我认为这是观念受限的结果。

我推动 NCADE 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打破多数 IES 员工的思维模式,并引入新的血液,致力于识别教育研究中的关键短缺,并推动更快速的解决方案,包括对研究者的需求更敏锐——更快周转的意义正在此。

(完)

☆ 教材建设文献索引

- [1]莫景祺. "在实践中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材使用监测队伍." 基础教育课程 . 04 (2024): 42-47.
- [2]靳晓燕. "建设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光明日报 2024-03-26, 013, 教育周刊 焦点.
- [3]刘海业,梁磊,and 邱仲军. "中小学数字教材建设模式思考——基于广东省的实践探索." 中国数字出版 2. 02 (2024): 109-115.
- [4]田慧生,and 雒义凡. "关于当前教材研究应高度关注的几个问题." 课程.教材.教法 44. 03 (2024): 4-7. doi:10.19877/j.cnki.kjcjf.2024.03.008.
- [5]刘骥,and 苟丹琪. "美国基础教育教材使用情况监测:实施背景、主要发现及对我国的启示." 课程.教材.教法 44. 03 (2024): 147-153. doi:10.19877/j.cnki.kjcjf.2024.03.025.
- [6]胡艳芬,and 陈丽冰. "数智时代的教材建设与国家知识管理——第 21 届上海课程论坛(国内)综述." 课程.教材.教法 44. 03 (2024): 157-159. doi:10.19877/j.cnki.kjcjf.2024.03.022.
- [7]莫景祺,and 王艳芳. "建立教材使用监测体系,为充分发挥教材育人功能提供制度保障." 基础教育课程 . 03 (2024): 7-15.
- [8]"国家教材委员会:全面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 云南教育(视界时政版) . Z1 (2024): 4.
- [9]王振宇,陆莹绮,and 李佳易. "数智时代的教材建设:变与不变——第 21 届上海课程论坛综述." 教育研究与评论 . 02 (2024): 33-41.
- [10]许朝军. "提高教材编写质量需秉持“开门编修”思维." 湖南教育(D 版) . 02 (2024): 13.
- [11]魏清顺, et al. "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下数字教材建设研究."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 03 (2024): 14-16. doi:10.13492/j.cnki.cmee.2024.03.001.
- [12]顾明远. "中小学教材研究要为教育强国建设服务." 中国教师 . 02 (2024): 6+10.
- [13]刘学智,曲锐,and 曹伟. "新时代高质量数字化教材建设的价值意蕴、基本逻辑和实践路径." 现代教育管理 . 03 (2024): 75-84. doi:10.16697/j.1674-5485.2024.03.008.
- [14]罗生全,and 张玉. "中小学教师教材开发的权力性质与权力运行机制." 教师教育学报
- [15]王攀峰. "我国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内涵、标准与路径." 北京教育学院学报 38. 02 (2024): 60-67. doi:10.16398/j.cnki.jbjieissn1008-228x.2024.02.009.
- [16]朱华,and 王紫悦. "教材使用治理现代化的逻辑理路及其推进路径." 教育理论与实践 43. 34 (2023): 25-30.
- [17]孙文静,and 王攀峰. "基础教育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文本分析——基于政策工具视角." 当代教育论坛 . 01 (2024): 61-71.
- [18]卞恒宇. "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追问、逻辑理路和中国式道路." 课程.教材.教法 43. 11 (2023): 28-34. doi:10.19877/j.cnki.kjcjf.2023.11.003.
- [19]张振,and 刘学智. "综合改革:中国式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智慧." 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 6. 05 (2023): 39-49. doi:10.13527/j.cnki.educ.sci.china.2023.05.007.
- [20]罗生全,and 随国栋. "教材建设现代化的政府治理逻辑与实践进路." 中国远程教育 43. 08 (2023): 35-41+68. doi:10.13541/j.cnki.chinade.2023.08.002.
- [21]罗生全,and 张玉. "教材建设国家事权的基本思想及品格特征." 教育研究与实验 . 04 (2023): 61-72.
- [22]李学,and 何金梅. "中小学教材治理现代化的文化逻辑."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 23. 03 (2023): 22-28.
- [23]陈淑清. "新时代教材治理现代化的十年探索:基本逻辑、实践路径和未来走向." 课程.教材.教法 43. 01 (2023): 20-28. doi:10.19877/j.cnki.kjcjf.2023.01.024.